

《隨想錄》與巴金的內心世界

徐鈺豪

摘要

《隨想錄》是巴金於文化大革命後創作的雜文集，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至一九八六年八月，刊登於香港的《大公報》，並由香港三聯書店集結出版。該書收有一百五十篇文章，有反思歷史、批判傳統思想的雜文，有懷念親友、作出自我懺悔的抒情散文，也有針對現實、抨擊社會不良現象的隨想。

巴金在文化大革命後重拾獨立思考，使《隨想錄》擁有極高的思想價值，並對於人們的精神生活有着微妙的影響。本文從《隨想錄》的文本中，挖掘巴金在文化大革命後，發展出幻覺重現、噩夢、服用安眠藥等心理創傷後遺症的痕跡；並引用西方學者對於心理治療的研究，推論巴金透過創作《隨想錄》，尋求更高層次的安全感、繼續發展自己的獨立思考、提升自己對生活的希望，治療自己以至讀者們的心理創傷。

關鍵詞：巴金、《隨想錄》、文化大革命、懺悔意識、獨立思考、心理創傷

巴金的精神狀態

在文化大革命後，巴金恢復文學創作，香港《大公報》的潘際垌於一九七八年十一月寫信向巴金約稿，巴金隨後把〈談《望鄉》〉寄給潘際垌發表，巴金的《隨想錄》便由一九七八年十二月起，於《大公報》的副刊〈大公園〉刊登出來。¹ 在《隨想錄》的一百五十篇文章中，有反思歷史、批判傳統思想的雜文，有懷念親友、作出自我懺悔的抒情散文，也有針對現實、抨擊社會不良現象的隨想。

香港三聯書店於一九七九年八月，把首三十篇隨想集結出版，充滿理想的巴金於其〈後記〉提出《隨想錄》的創作計劃：他希望於其後四年，每年多印一本《隨想錄》，直到一九八四年為止。² 以《隨想錄(第一集)》平均每篇二千八百字來計算，三十篇隨想共有八萬四千字，而巴金於一九三九至四零年曾以八個月時間寫成超過三十萬字的《秋》，每年撰寫十萬字對於他來說，似乎是輕而易舉。³ 但是當時巴金已經七十多歲，還要不時在國內外出席各種會議，更在一九八三年確診患上帕金森症，雙手終日不由自主地顫抖，其寫作速度已大不如前。在巴金每天只能勉強地書寫一、二百字的時候，他為何不聽取朋友的勸告而提早擱筆，反而以強大的意志力堅持寫作，終於在一九八六年八月完成一百五十篇隨想？⁴ 能使巴金克服生理障礙的因素，不僅是因為他要兌現自己的「豪言壯語」，還跟他的精神狀態有莫大的關係。⁵

¹ 胡德培，〈赤子真情——巴金及其《隨想錄》〉，《海燕》，期 1(2006年1月)，頁 24-26。

² 巴金，〈後記〉，收入氏著，《隨想錄(第一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79)，頁 169。為分辨《隨想錄》的單行本與合訂本，本文把一九七九年出版的第一本單行本名為《隨想錄(第一集)》，而《隨想錄》則為整套集子的總稱。

³ 李存光，《百年巴金 生平及文學活動事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頁 57-60。

⁴ 有關巴金於病中寫作的情況，見巴金，〈病中(五)〉，收入氏著，《病中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4)，頁 122-124。而巴金於一九八六年八月二十日完成最後一篇隨想〈懷念胡風〉，見巴金，〈懷念胡風〉，收入氏著，《無題集》，頁 197。

⁵ 巴金於其第三十一篇隨想〈豪言壯語〉中，也提及《隨想錄》的創作計劃，見巴金，〈豪言壯語〉，收入氏著，《探索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1)，頁 1。

可是，巴金在文化大革命後的精神狀態並不理想，他除了會在無意中憶起與蕭珊一同受苦、哭別妻子的情景，又會在夢裡重溫在文化大革命中被抄家、追打、批鬥的可怕經歷，更為了促使自己在巨大的心理壓力下進睡，慣性地服用安眠藥。

巴金在〈再憶蕭珊〉一文中，描述了他在病房裡「遇見」亡妻的一次經歷：

我醒着，我在追尋蕭珊的哭聲……我終於輕輕地喚出了蕭珊的名字：「蘊珍」。我閉上眼睛，房間馬上變換了。在我們家中，樓下寢室裡，她睡在我旁邊另一張床上，小聲囑咐我：「你有甚麼委屈，不要瞞我，千萬不能吞在肚裡啊！」……在中山醫院的病房裡，我站在床前，她含淚望著我說：「我不願離開你。沒有我，誰來照顧你啊？」……在中山醫院的太平間，擔架上一個帶人形的白布包，我彎下身子接連拍着，無聲地哭喚：「蘊珍，我在這裡，我在這裡……」我用鋪蓋蒙住臉。我真想大叫兩聲。我快要給憋死了。「我到哪裡去找她？」我連聲追問自己。於是我又回到了華東醫院的病房。耳邊仍是早已習慣的耳鳴。⁶

這個現象稱為幻覺重現(*flashback*)。幻覺重現是一些過往經歷的片段，突然進入一個人當前的意識。經歷幻覺重現的人並不是在回憶往事，而是在想像中再經歷該件事情。那些過往的經歷，可以以影像、氣味、味道，甚至痛楚的方式呈現，帶來深刻而且難受的情感。⁷

巴金說自己「一生做過太多的夢」，但是噩夢做得最多的時期是在文化大革命結束以後。他在夢中受到鬼怪圍攻，並與它們戰鬥；他夢見紅衛兵翻牆進屋、打破東西、拿銅頭皮帶打人；他還夢見批鬥自己的專案人員做出猛獸的表情，而且兇相

⁶ 巴金，〈再憶蕭珊〉，收入氏著，《病中集》，頁 137-138。

⁷ Sandra L. Bloom, "An Elephant in the Room: The Impact of Traumatic Stress o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 Kristen Brown Golden and Bettina G. Bergo eds., *The Trauma Controversy: Philosophic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p. 152.

更愈來愈可怕，彷彿他們將要撲在他的身上啃食他一般。⁸ 而巴金在那些經常發噩夢的期間，每晚需要服用兩片安眠藥(安定，Antenex)，才可以酣睡三、四個小時。⁹

若果巴金生活在現今社會，他的親朋戚友會帶他向心理醫生求診。他在文化大革命中經歷的抄家、虐待、批鬥，除了造成肉體上的創傷，當中給他帶來的冤屈、恐懼、羞愧、侮辱，在他的精神上造成極大的心理創傷，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以後，發展出各種的後遺症。

心理創傷的成因可以分為生理因素及心理因素兩類：在生理上，當一個人遭到虐待、性侵犯，或突如其來的暴力傷害，除了構成肉體上的直接創傷，同時也會在人的心靈上造成傷害；而在心理上，當一個人：

1. 在生活上遇上嚴峻的問題；
2. 價值觀被嚴重歪曲；
3. 經歷了不應該發生在自己身上的事；
4. 不經意地做了不正當的事；
5. 遭受到死亡的威脅；
6. 成為了災難的受害者；

⁸ 巴金，〈我的噩夢〉，收入氏著，《病中集》，頁 111-113。

⁹ 巴金，〈病中(二)〉，收入氏著，《病中集》，頁 37-38。

這些事會使人的情感發生特殊的變化，在其心靈上造成難以磨滅的精神印記，繼而形成心理創傷。¹⁰

巴金在一九六六年九月初被第一次抄家，「革命群眾」認為他的態度不老實，並未完全交代自己的「反動」資料，故此他們決定抄巴金的家，以搜集他的「犯罪證據」。該次抄家由上午到下午，歷時六、七個小時，「革命群眾」把巴金的書櫥裡的重要物資全數抄走，又利用封條把所有書櫥封鎖起來，更把一張揭發巴金的「罪行」的大字報貼在他的家門上，威嚇他往後要「老實交代」一切。這使他意識到「革命群眾」早晚會在自己的書刊、信件、文件中，搜查出「犯罪證據」，而隨着自己被「定罪」，更頻繁、破壞性更大的抄家會陸續而來，他實在地感到在劫難逃。¹¹ 語言學家季羨林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抄過家，他想到中國古代「瓜蔓抄」的做法，擔心那些無辜的親朋戚友與自己的關係被挖掘出來，跟隨着自己倒霉。¹² 巴金的朋友大多也是作家、編輯，他們比巴金更早被關進「牛棚」，似乎沒有因為他而受到牽連；¹³ 巴金心痛的是他的家人因為他而無辜受苦，例如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的一次抄家當中，幾個中學生翻牆進屋，不但抄走了一些東西，而且狠狠地以銅頭皮帶打傷了蕭珊的眼睛，更不問情由地把巴金和他的家人全關在廁所裡面，使他們身心受創。¹⁴

巴金在一九七九年五月，在北京作家協會的小型宴會上說過：

¹⁰ Charles E. Scott, "Trauma's Presentation," in Kristen Brown Golden and Bettina G. Bergo eds., *The Trauma Controversy: Philosophic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s*, p. 117.

¹¹ 巴金，〈二十年前〉，收入氏著，《無題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6），頁 145-146。

¹² 季羨林，《牛棚雜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頁 62。

¹³ 巴金於文化大革命開展初期，以中國作家代表團副團長的身份，在北京、漢口、上海等地出席亞非作家緊急會議，他於一九六六年八月把賓客送走後，返回中國作家協會上海分會報到，才被關進「牛棚」，見巴金，〈「緊箍咒」〉，收入氏著，《無題集》，頁 30。

¹⁴ 巴金，〈紀念〉，收入氏著，《無題集》，頁 103。

在「文化大革命」期間有些人無緣無故把人打死，只是為了「打壞人」。現在知道打死了不少好人，可是已經晚了。¹⁵

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學生和「革命群眾」，並不會對「壞人」流血產生憐憫，他們變得像嗜血的虎狼，任意地殘害「壞人」；他們並不講人道主義，甚至把「壞人」折磨致死，造成大量冤案、錯案。巴金在文化大革命中也被打過，他在〈人道主義〉中，敘述了一次被人追打的事：

一九六六年我作為審查對象在作家協會上海分會的廚房裡勞動，一個從外面來的初中學生拿一根鞭子抽打我，要我把他帶到我家裡去……他鞭打，我不能反抗，只有拚命奔逃。他並不知道我是幹甚麼的，只聽人說我是「壞人」，就不把我當人看待。他追我逃，進進出出，的確是一場絕望的掙扎！我當時非常狼狽，只是盼望那個孩子對我講點人道主義……我還記得他惡狠狠地對造反派說：「對這些壞人就是不能講人道！」¹⁶

巴金說自己是一個「身經百鬥」的「牛鬼」，在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人都可以揪住他批鬥，但是他對第一次全市性的批鬥大會和電視批鬥大會的印象特別深刻，因為它們對他來說都是從未經歷過的事。該兩次批鬥大會都在上海雜技場舉行，他在往返會場的途中，看見不少批判自己的大字標語，預料到自己在批鬥大會中凶多吉少；雜技場的舞台是圓形的，巴金在舞台上接受批鬥，就像被四面八方的拳頭圍攻着，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壓力；他每次都是被幾名大漢拖進會場，又要全盤接受強加在自己身上的各種「罪名」，更不可以進行辯駁，他低頭彎腰記下批鬥的內容，加上台下一片「打倒巴金」的喊聲，使他頭昏眼花、思想混亂，在批鬥大會上講話吞吞吐吐，表現得極為狼狽。¹⁷無休止的批鬥，使巴金面對無止境的侮辱和人身

¹⁵ 巴金，〈人道主義〉，收入氏著，《無題集》，頁 22。

¹⁶ 巴金，〈人道主義〉，頁 23-24。

¹⁷ 巴金，〈解剖自己〉，收入氏著，《真話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2），頁 131-133。

攻擊，他徹底否定了自己，帶給自己極為嚴重的精神折磨，而當他聽聞朋友們在批鬥會上挨打、受辱，甚至在批鬥會後失蹤、自殺，使他陷入精神崩潰的邊緣，在窮途末路之際，終止當前壓迫的辦法就只有自殺。但是巴金知道自殺在當時是被視為「自絕於人民」的「反革命」行為，其妻兒會因此而承受更大的壓力，背上更嚴重的「罪名」。¹⁸ 巴金不願妻子和兒女吃下自己種的苦果，最終不能不打消自殺的念頭，硬着頭皮繼續忍受各種人身攻擊。¹⁹

人類擁有非常複雜的頭腦和強大的記憶力，使我們成為最有智慧的生物，同時也使我們極難排除心理創傷帶來的後遺症。心理創傷不但使人產生創傷記憶，長久地依附着人的心靈；而且，心理創傷使人的記憶模式產生變化，造成不斷回憶創傷事件、無法忘掉創傷記憶的極端狀況。因此，曾經經歷心理創傷的人，會出現幻覺重現、噩夢、行為重演(reenactment)等後遺症。而有些患者為了排除上述的後遺症，嘗試以濫用藥物、酗酒、濫用暴力、瘋狂進食、濫交、自殘等行為麻醉自己，但往往會發展出其他的生理傷害。²⁰

心理創傷的康復

翻譯家楊絳在《幹校六記》中屢次指出「最經磨的還是人的血肉之驅」，她在文化大革命中看見人們被「革命群眾」折磨，在他們的身上留下永不磨滅的傷痕，

¹⁸ 在文化大革命中，自殺被視為「自絕於人民」的「反革命」罪行，如北京大學歷史系教授汪錢於自殺後，立即被定為「反革命分子」，被進一步批鬥，見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74-75。

¹⁹ 巴金，〈再論說真話〉，收入氏著，《探索集》，頁 104-105。

²⁰ Sandra L. Bloom, "An Elephant in the Room: The Impact of Traumatic Stress o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pp. 152-154. 而巴金服用的安眠藥安定有相當的成癮性和耐藥性，使人對該藥產生依賴，見 Helena Vormaa, Hannu H. Naukkarinen, Seppo J. Sarna and Kimmo I. Kuoppasalmi, "Predictors of Benzodiazepine Discontinuation in Subjects Manifesting Complicated Dependence," *Substance Use & Misuse*, 40:4 (Jan, 2005), pp. 499-510.

使她十分驚嘆，並且感到憐憫。²¹ 而人的心靈並不會比肉體耐磨，既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有不少人被殘害折磨致死，那麼，應該也有不少人承受不住巨大的心理壓力而自尋短見，或患上各種精神病。肉體上的折磨會在劫後餘生的人的身上，留下傷痕和烙印，人們可以為它們對症下藥；但是精神上的折磨在人的心靈上留下的創傷，卻不容易被人發現，而且往往被忽略。因此，遭受心理創傷的人几乎是無法痊癒的。

然而，有極少數的患者擁有巨大的勇氣和忍耐力，排除可怕的記憶和情感，從心理創傷中康復過來。首先，患者需要處於一個相對安全的境地，避免自己再次受到傷害，及減低心中的恐懼；其次，患者需要發展自己的認知能力，提升自己的決策能力和解難能力，以發展出一套自我舒緩的技能，面對各種壓力；而最重要的，是患者要對生活存有希望，以克服一切心理障礙，承受心理創傷帶來的痛苦，重新過着正常人的生活。²²

巴金在文化大革命中的「問題」，於一九七三年七月，由王洪文、馬天水、徐景賢、王秀珍、馮國柱、金祖敏落實，「作人民內部矛盾處理，不戴反革命帽子，發給生活費」。²³ 因為該個決定只是以口頭宣佈，並沒有書面文件為憑，巴金不能確定那是對他「落實政策」，還是另有陰謀，而且他雖然「不戴帽子」，但他知道他依然會遭受白眼，不能像一般人那樣過正常的生活。他作出試探，表示希望進行翻譯工作，「市委書記」想到那個時候沒有人會讀「黑老 K」巴金的作品，更加不會讀翻譯作品，他的翻譯作品並不影響運動的進行，因此批准他進行翻譯工作。

²⁴ 巴金在被投閒置散的情況下，先後翻譯了屠格涅夫(Ivan Sergeyevich Turgenev,

²¹ 楊絳，《幹校六記》(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1)，頁7、10。

²² Sandra L. Bloom, "An Elephant in the Room: The Impact of Traumatic Stress o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pp. 158-160.

²³ 巴金，〈紀念雪峰〉，收入氏著，《隨想錄(第一集)》，頁161-162。

²⁴ 在文化大革命中，巴金被指為「文藝黑線」的「黑老 K」。當中「文藝黑線」是指三十年代由瞿秋白等人領導的中國左翼作家聯盟，見姜弘，〈巴金給了我們什麼？〉，<http://www.aisixiang.com/data/20643.html> (2008/9/9)。而「黑老 K」是撲克牌中僅次於「A」

1818-1883)的《處女地》(*Virgin Soil*)，及赫爾岑(Aleksandr Ivanovich Herzen, 1812-1870)的《往事與隨想》(*My Past and Thoughts*)，而在文化大革命後，巴金於一九七七年四月被撤銷一切指控，從此他不再被任意批鬥或抄家，他的人身安全得到初步的保障。²⁵

其次，巴金於文化大革命中，逐漸發現「造反派」和「革命群眾」做事前後矛盾，露出破綻：

1. 巴金於一九六一年以韓戰為題材，完成短篇小說〈團圓〉，而小說於一九六三年被改編為電影《英雄兒女》。²⁶ 於文化大革命中，蕭珊在電影院看《英雄兒女》後，興奮地告訴巴金，他的名字仍然保留於電影中，她認為他的問題應該不太大。巴金相信妻子的話，決心認真地作自我檢查，以求盡快解決問題。但過了不久，〈團圓〉被「造反派」指為渲染戰爭恐怖、鼓吹和平主義的「反動戰爭文學」，而《英雄兒女》也被禁止公映，巴金也因此而受到批判，他感到恐懼和失望。但是在批判「反動戰爭文學」的運動後，周恩來總理挑選《英雄兒女》作為反映「抗美援朝」的好電影，在全國公映；而「造反派」卻警告巴金不要因此而「翹尾巴」，認為電影還是有問題。巴金感到十分無奈，他表面上聽從「造反派」的話，心裡卻想着「政策」的朝令夕改，令「好人」和「壞人」也無所適從。²⁷
2. 「造反派」於一九七零年初，以「腹地」為「心腹之患的地方」，指出巴金曾於一九三二年寫下文章，鼓動青年到國民黨心腹之患的「蘇區」進行破壞，命

的牌，指巴金在「文藝黑線」的影響力僅次於魯迅，見徐開壘，《巴金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頁 579-580。

²⁵ 徐開壘，《巴金傳》，頁 609-622。

²⁶ 李存光，《百年巴金 生平及文學活動事略》，頁 119。

²⁷ 巴金，〈灌輸和宣傳(探索之五)〉，收入氏著，《探索集》，頁 79-81。

令他作出交代。²⁸ 巴金感到「造反派」的指控非常無稽，以「腹地」為「內地」作出抗辯，但是「造反派」接連的質問，使巴金感到十分厭倦，他不再堅持自己的解釋，承認「腹地」為「心腹之患的地方」，他因此被嚴厲地批判，並作出自我檢討。但過了不久，《人民日報》以「內地」為解釋，刊出關於「以色列腹地」的消息，巴金抄下報導的內容，留待日後作為抗辯的證據，但是「造反派」從此再沒有利用「腹地」來批判巴金。²⁹ 巴金意識到「造反派」缺乏知識，他們只會斷章取義，誣蔑「壞人」。

巴金看出「造反派」和「革命群眾」只是一些空殼，他們知識貧乏，並且沒有自己的思想，也沒有明確的人生目標；他們只知道見風轉舵、恃強凌弱。巴金意識到他們只是透過欺壓知識份子，來抬高自己的地位，掩飾自己的無知。巴金逐漸回復知識份子應有的理性，尋回失去的獨立思考，他不再盲目地相信別人，並以自己的認知、判斷，去了解眼前的狀況。但是由於他仍然身處「牛棚」，被「造反派」和「革命群眾」看管着，因此他需要假裝順從，避免他們看出自己的改變，靜待能夠逃出新天的機會。

而隨着巴金恢復獨立思考的能力，他看得出「四人幫」由始至終都在說謊，而他們的謊話也「快要破產」，因此他即使是在混日子，也要堅持生活下去，他要看到「四人幫」的結局，他要得到解放。³⁰ 而隨着「四人幫」被打垮下來，巴金重獲自由，他對未來充滿理想，他希望運用自己的思考，說自己心裡的話，寫自己的文章，為祖國工作到生命的最後一息。³¹

²⁸ 巴金在報刊發表的原文為：「我想我們應該去犧牲的地方也並不是東北的戰場，如某一些人所說的，而是中國腹地，是民間，在那裡有千千萬萬的人需要我們底幫助，只有他們才是最痛苦的。」，見巴金，〈「貢獻給今日的青年」〉，收入氏著，《巴金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冊 18，頁 276。

²⁹ 巴金，〈「腹地」〉，收入氏著，《探索集》，頁 109-111。

³⁰ 巴金，〈十年一夢〉，收入氏著，《真話集》，頁 54-55。

³¹ 巴金，〈懷念蕭珊〉，收入氏著，《隨想錄（第一集）》，頁 32。

如以上敘述，巴金雖然在人身安全得到初步的保障、在苦難中回復理性的思想、開始對生活抱有希望，但是這些只是他治療心理創傷最基本的條件。面對未來的挑戰、政治的變數、內在的心理壓力，巴金的康復之路是荊棘滿途的，因此，他需要尋求更高層次的安全感、繼續發展自己的獨立思考、提升自己對生活的希望，以逐漸減輕心理創傷對他構成的影響。

巴金對安全感的尋求

巴金由開始寫作到文化大革命爆發，當了四十多年作家，他從來沒有丟下自己的筆，寫作就是他的職業。在文化大革命期間，他被「『四人幫』及其爪牙」趕出了文壇，被「打翻在地，踏上一腳」，甚至叫他「永世不得翻身」。³²的確，禁止一個當了大半世作家的人寫作，與拿掉他的性命無異，除此之外，巴金還要接受無止境的批鬥和抄家，他的人身實在毫無安全感。

而在文化大革命以後，巴金回復了人身自由。為了提升自己的安全感，他需要認清過往令他受到傷害的事件的本質，從而預防自己再次受到傷害。巴金借用鄧樸方的講話，指出林彪和「四人幫」奉行的是「披上『革命』外衣的封建主義」，而在文化大革命中「產生大量非人道的殘酷行為」，是源於「披着『左』的外衣的宗教狂熱」。³³巴金知道文化大革命一旦再次爆發，並不只意味着自己再次被趕出文壇，或是自己的生命安全遇上更大的威脅，他嚴正地指出：

³² 巴金，〈春蠶〉，收入氏著，《探索集》，頁 55。

³³ 鄧樸方於中國殘疾人福利基金會全體工作人員會議上指出：「『文化大革命』搞的就是以『民主』為先導的封建主義，是宗教狂熱。大量的非人道的殘酷行為就是在那時產生的。」見巴金，〈人道主義〉，頁 22-25。

絕不讓我們國家再發生一次「文革」，因為第二次的災難，就會使我們民族徹底毀滅。³⁴

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已幾乎將傳統中國文化完全革掉，在國家休養生息之際再承受一次災難，本已破爛不堪的傳統文化必將灰飛煙滅，而所有中國人民則會淪為沒有靈魂的軀殼。因此，巴金在《隨想錄》中揭露產生文化大革命的原因，揭發需要為文化大革命負責的人物，一再讓人們認清災難的真相，竭力防止災難再次發生。

其次，當一個成名的作家不能預見其文學的未來，整個文藝創作事業便會顯得一片模糊。然而在文化大革命後，文藝創作的氛圍仍然是陰晴不定，巴金的創作也屢受影響。³⁵ 巴金視寫作如性命般珍貴，他希望自己以至全國作家的寫作生活得到保障。巴金指出創作自由是創作繁榮的必要條件，使作家充分運用自己的思想，寫出藝術性更高的作品。他以中國作家協會主席的身份，帶領全國作家積極爭取創作自由，他引用演員趙丹的遺言——「管得太具體，文藝沒希望」——說出自己對文藝事業的看法，並要求主管文藝創作的機構尊重作家的創作自由。³⁶ 終於，他的努力沒有白費，在一九八五年一月舉行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中，胡啟立代表中共中央提出給予中國作家創作自由的保證，從此，作家們便可以安心地進行創作。³⁷

³⁴ 巴金，〈「文革」博物館〉，收入氏著，《無題集》，頁 134。

³⁵ 例如巴金於一九八一年七月完成〈懷念魯迅先生〉，寄往《大公報》發表，但是《大公報》的編者趁着潘際珂在北京度假，把文章中與文化大革命有關的字句大幅刪除，巴金知悉後十分憤怒，於隨後的〈「鷹的歌」〉「開天窗」以示抗議，見巴金，〈鷹的歌(存目)〉，收入氏著，《真話集》，頁 74。而刪節事件的始末及〈「鷹的歌」〉的全文，見巴金，〈「鷹的歌」〉，收入氏著，《隨想錄(作家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頁 294-297。

³⁶ 巴金，〈「沒什麼可怕的了」〉，收入氏著，《探索集》，頁 121。

³⁷ 巴金，〈「創作自由」〉，收入氏著，《無題集》，頁 36-39。

巴金獨立思考的發展

巴金在青年時代信奉無政府主義，強調發展個人的理性，以獨立思考解決問題。³⁸但是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巴金在「造反派」和「革命群眾」的威嚇下，完全放棄獨立思考，無條件地接受別人灌輸給自己的思想，徹底地否定了自己。而巴金透過上述的「《英雄兒女》」和「腹地」等事件，發現了「造反派」和「革命群眾」的破綻，慢慢地恢復部分的獨立思考，擺脫「造反派」和「革命群眾」的思考模式。

季羨林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處境與巴金相似，他在「牛棚」生活了一段長時間，腦筋變得愈來愈糊塗，心情也愈來愈麻木，對於好壞、善惡、美醜，失去判斷力，而對於別人的惡意批評也不以為然。³⁹巴金在文化大革命中顯然是一個受害者，他卻不像其他人一樣，把責任完全歸咎於林彪和「四人幫」的集團，他反而運用獨立思考，指出不能單單責怪林彪和「四人幫」的集團，他認為自己對於文化大革命也有責任：若果自己當時不是喪失了獨立思考，盲目地相信別人，林彪和「四人幫」的集團便未必能夠肆意地濫用權力，殘害知識份子。⁴⁰

巴金把獨立思考伸延到朋友方面，他雖然在文化大革命中沒有批判別人的資格，但他也沒有想辦法幫助朋友，他知道自己「負了一大筆友情的債」，對於亡友

³⁸ 巴金於一九二零年閱讀克魯泡特金(Pyotr Alexeyevich Kropotkin, 1842-1921)的《告少年》(*An Appeal to the Young*)，對無政府主義有了初步的認識，見巴金，〈我的幼年〉，收入氏著，《巴金文集》(香港：南國出版社，1970)，冊 10，頁 7-8；而無政府主義主張廢除政治管理機構，組織提倡絕對自由的個體，為了他們的共同利益，建立地方團體，以充分發展個人的理性，見 Ian Adams and R.W. Dyson, *Fifty Major Political Thinkers* (London: Routledge, 2003), pp. 151-154.

³⁹ 季羨林，《牛棚雜憶》，頁 176-177。

⁴⁰ 巴金，〈一顆核桃的喜劇〉，收入氏著，《隨想錄(第一集)》，頁 62。

的含冤受屈有着不能推卸的責任。他要思考出親友們死亡的真實和具體的情況，替他們洗雪沉冤，「讓更多的人記住他們」，學習他們：⁴¹

1. 巴金於一九三五年與黎烈文成為朋友，他們都尊重魯迅。抗日戰爭後黎烈文到了台灣大學教課，但是在文化大革命中，他在魯迅的文選中被評為「反動文人」。而即使在文化大革命完結以後，替一個長期在台灣生活的人恢復名譽的手續，是沒有人會辦的。故此巴金運用獨立思考，以個人的經驗作為判斷是非的標準，於〈懷念烈文〉中記述黎烈文「埋頭寫作，不求聞達」的一生，指出黎烈文在台灣沒有放棄寫作，更令當地的文化界人士獲益良多。⁴² 結果，雖然黎烈文沒有被官方正式平反，但是於一九八一年由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出版的《魯迅全集》中，關於其註釋上的「反動文人」的字句被全部刪除，可見巴金的獨立思考並沒有出錯，而他的文章也發揮了影響力。⁴³
2. 胡風作為「胡風反革命集團」的主腦，於一九五五年五月被關押在秦城監獄。在文化大革命後，胡風於一九七九年一月四日被釋放。而中共中央先後於一九八零年九月及一九八五年六月，為胡風作出平反，但是那些平反並不徹底。⁴⁴ 巴金相信胡風並不會因此而「心安理得」，因為他曾經在「反胡風集團鬥爭」中寫過三篇批判文章，和主持過幾次批判會，他要作一番努力補償過去對亡友的損害。故此，巴金再次運用獨立思考，他在〈懷念胡風〉中指出，他看不出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主張有甚麼大不對，也看不出胡風與其他同志的結合有甚麼

⁴¹ 巴金，〈《懷念集》序〉，收入氏著，《真話集》，頁 74-75。

⁴² 巴金，〈懷念烈文〉，收入氏著，《探索集》，頁 59-69。

⁴³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冊 5，頁 6；冊 12，頁 153；冊 15，頁 573。

⁴⁴ 經過兩次平反後，中共仍然保留對胡風的「文藝思想和主張錯誤」和「小集團」的指控，見梅志，《胡風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頁 640-647、734-736、752-755、779-783。

問題。⁴⁵ 最終，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會於一九八八年六月，通過《中央辦公廳關於為胡風同志進一步平反的補充通知》，對胡風作出徹底的平反。⁴⁶

巴金把獨立思考推展到社會層面，倡議人們把責任放在個人慾望之上，為自己的所作所為負責。他針對社會上的黃金熱潮，批評販賣假貨、壞貨的商人，指他們損公肥私、禍國殃民。他指出每個人都是社會的一分子，有責任建設社會和國家。他希望人們「把個人的生命連繫在群體的生命上面」，「把人民和國家的位置放在個人之上」，抵擋住黃金熱潮的誘惑，不要被熱潮沖倒，要有為理想獻身的精神，追求集體的幸福和繁榮。⁴⁷

巴金更把獨立思考推展到國家的層面，鼓勵國家領導人把道德放在政治之上，使人民重新成為所有社會活動的著眼點。他同意鄧樸方的「我們的事業是人道主義的事業」的說法，希望國家領導人重視人的價值，關注人民的利益。巴金指出不要因為資產階級曾經使用人道主義反對宗教統治和帝制統治，就盲目地為了批判資本主義而反對人道主義。他提醒人們吸取教訓，不要重蹈文革那些非人道行為的覆轍，使本來可以繼續為國家創造精神財富的作家無辜死去，使國家和人民蒙受難以計量的損失。⁴⁸

巴金在文化大革命後重新擁有獨立思考，他的獨立思考並以後抑制反彈效應的方式，達到前所未有的高度。⁴⁹ 他不會盲目相信別人，反而會不斷尋求真理，建立一套自己的價值系統，以作出更理性、更準確的判斷，解決眼前的問題。

⁴⁵ 巴金，〈懷念胡風〉，頁 191-197。

⁴⁶ 梅志，《胡風傳》，頁 785-786。

⁴⁷ 巴金，〈「尋找理想」〉，收入氏著，《無題集》，頁 57-60。

⁴⁸ 巴金，〈人道主義〉，頁 22-25。

⁴⁹ 後抑制反彈效應是指當人的思維被壓抑時，它們會在其後以一種更強勢的方式回歸，見 Daniel M. Wegner, David J. Schneider, Samuel R. Carter and Teri L. White, "Paradoxical Effects of Thought Supp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1 (July, 1987), pp. 11-12.

巴金對生活的盼望

經歷十年的文化大革命後，目睹「四人幫」垮台的巴金，對中國的未來回復信心。巴金在一九七九年五月訪問法國，他遇見了大量的法國朋友，他感到他們關心中國的近況，並且勤奮地學習中國語文和研究中國文學，希望了解近代中國人民的遭遇。⁵⁰ 如哈維爾(Václav Havel, 1936-2011)所說，來自西方擁有自由思想的知識份子，對捷克的持不同政見者的關心和支持，減輕了那些持不同政見者心中的恐懼，使他們脫離困惑的狀況，對未來抱有更大的希望。⁵¹ 朋友們對中國的深厚情誼，使巴金意識到中國人民更應該義無反顧地顧念自己的祖國，努力建設新的中國，使人們看到中國更好的一面。

但是隨着年月過去，巴金日漸衰老，工作能力逐漸減退，顯得力不從心。然而，青年是國家和人民的希望，巴金能夠把自己的理想，寄託在擁有無限精力的青年身上。他相信青年人有充沛的覺悟力、勇氣和決心，建設國家的未來，因此，他非常重視青年人的培養：巴金觀察到孫女小端端的功課量很大，但她的學習進度並不理想，更要面對來自功課和考試的巨大壓力，巴金指出「灌輸和責罵」只會令孩子變得唯唯諾諾，而且對建設國家的未來並沒有幫助。他促請國家推動教育改革，辦好每所學校、培訓好每位老師，以「『啟發』和『誘導』」培養孩子，使孩子們成長後運用靈活的思考，對國家的未來作出貢獻，未來的社會才會有希望。⁵²

而巴金把文學事業發展的希望，放在中、青年作家的身上。作為中國作家協會主席，巴金對於在一九八五年一月舉行的中國作家協會第四屆理事會第一次會議中，劉賓雁、王蒙等「革新派」作家當選中國作家協會副主席，感到十分鼓舞。巴

⁵⁰ 巴金，〈在尼斯〉，收入氏著，《隨想錄(第一集)》，頁 96。

⁵¹ Václav Havel, trans. E. Kohák and R. Scruton, "Politics and Conscience," in Jan Vladislav eds., *Living in Truth*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87), p. 148.

⁵² 巴金，〈小端端〉，收入氏著，《真話集》，頁 77-79。

金指出年輕作家以高票數當選作家協會副主席，是「藝術民主」的表現，可以使文學容納不同意見、不同風格的作品，吸引不同年齡、不同階層的讀者，使作家和讀者產生互動，相輔相成，創造出更多樣化的作品。巴金希望中、青年作家創造出更多、更優秀、更多元化的文學作品，迎接真正的「中國文學的黃金時代」。⁵³

即使文化大革命使巴金失掉至親、心靈受創，巴金仍然熱愛祖國，對中國的前途充滿信心，對自己的工作和生活抱有希望和理想。而正因為巴金有這樣遠大的目光，對生活有崇高的理想，所以他能夠忍受痛苦，舒緩自己的心理創傷。他更積極鼓勵年青人，勉勵他們抱着信心、懷着目標，一同去建設更美好的未來。

小結

巴金從其創作生涯領悟出，生活是「藝術創作的源泉，而且是唯一的源泉」，作家會把自己在生活中的所見所聞寫在作品中，而「離開了生活總不會有好作品」。⁵⁴ 換句話說，讀者可以從文學作品中，體現作家的物質生活，也可以進一步地窺探作家寫作時的精神狀態。的而且確，讀者可以從巴金於建國前所寫的小說，透視巴金青年時代於大家庭的生活，也可以體現他於抗戰及內戰時期，顛沛流離的境況；從巴金建國後撰寫的小說、散文、報告文學，我們可以觀察他採訪不同國家時的所見所聞；而從《隨想錄》中，我們則可以窺探巴金晚年的生活，從而走進他的內心世界。

⁵³ 巴金，〈「創作自由」〉，頁 36-39。

⁵⁴ 巴金，〈文學的作用〉，收入氏著，《隨想錄(第一集)》，頁 48。

在文化大革命中，作家不再是一份崇高的職業，作家們全都變成「牛鬼蛇神」，他們固然不能寫作，更要面對無止境的屈辱、嘲弄、折磨、毒打，身心都受到極為嚴重的創傷。巴金作為「資產階級反動權威」和「黑老 K」，在文化大革命中承受極不人道的遭遇，繼而造成嚴重的心理創傷。雖然心理創傷不易被察覺得到，但是讀者從《隨想錄》中，可以發現巴金在文化大革命後，患有幻覺重現和發噩夢的心理創傷後遺症，也需要服用安眠藥幫助入睡，可見他從文化大革命後的經歷中，所造成的心理創傷並不輕微。而幸運地，在文化大革命後期，巴金的人身安全得到初步的保障，他逐漸回復理性的思想，並開始對生活抱有希望，成為他治療心理創傷的三項基本條件。

巴金並不是心理學家，也不懂得心理治療的理論，他最初撰寫《隨想錄》的時候，也許只是嘗試壓抑內心的恐懼，抒發自己真實的思想。巴金透過《隨想錄》揭露文化大革命的本質，遏止災難再次發生，以獲取更高層次的安全感；巴金並不屈服於政治上的壓力和心靈上的傷痛，他運用獨立思考解決自己、亡友，以及社會的問題，舒緩來自各方面的壓力；他倡議落實教育改革，把國家的希望放在青年人身上，又鼓勵中、青年作家推動文學事業發展，提升自己對未來生活的希望。當巴金寫下一篇篇隨想，心理創傷對他的影響逐漸消滅，他的感覺愈益良好，他決定「要繼續寫下去」，「寫出不是一本，而是幾本《隨想錄》」，⁵⁵ 與心中的恐懼作出長期戰鬥，直到它完全消失為止。

但是，當巴金患上帕金森症，寫作速度極其緩慢的時候，他大概不是單純為了兌現自己的承諾，堅持每天書寫一、二百字，勉力完成一百五十篇隨想。他曾經指出寫作是為了「找尋一條救人、救世、也救自己的道路」，他寫作不只是為了自己，他始終承擔着知識份子救國救民的責任。⁵⁶ 巴金知道有千千萬萬的人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受災劫，受到心理創傷的後遺症折磨，承受着巨大的心理壓力，忍受着

⁵⁵ 巴金，〈把心交給讀者〉，收入氏著，《隨想錄(第一集)》，頁 51。

⁵⁶ 巴金，〈再談探索〉，收入氏著，《探索集》，頁 38。

劇烈的傷痛而無處宣洩。他真切地感受到那些後遺症的可怕，因此，他從撰寫《隨想錄》的過程中，無意中獲得治療心理創傷的良方的時候，他希望繼續撰寫《隨想錄》，除了作出自我治療外，更希望讀者們能在閱讀《隨想錄》的時候，建立自己的獨立思考及對未來生活的希望，藉以舒緩心中的鬱結，逐漸脫離心理創傷的苦海。

徵引書目

專書

1. 巴金，《巴金文集》。香港：南國出版社，1970。
2. 巴金，《巴金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93。
3. 巴金，《病中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4。
4. 巴金，《真話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2。
5. 巴金，《探索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1。
6. 巴金，《無題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86。
7. 巴金，《隨想錄(第一集)》。香港：三聯書店香港分店，1979。
8. 巴金，《隨想錄(作家版)》。北京：作家出版社，2009。
9. 李存光，《百年巴金 生平及文學活動事略》。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2003。
10. 季羨林，《牛棚雜憶》。北京：中共中央黨校出版社，1998。
11. 徐開壘，《巴金傳》。上海：上海文藝出版社，2003年第二版。

12. 梅志，《胡風傳》。北京：北京十月文藝出版社，1998。
13. 楊絳，《幹校六記》。香港：廣角鏡出版社，1981。
14. 魯迅，《魯迅全集》。北京：人民文學出版社，1981。
15. Adams, Ian and Dyson, R.W. *Fifty Major Political Thinkers*. London: Routledge, 2003.
16. Golden, Kristen Brown and Bergo, Bettina G. eds., *The Trauma Controversy: Philosophic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s*. Albany: State University of New York Press, 2009.
17. Vladislav, Jan eds., *Living in Truth*. London: Faber and Faber Limited, 1987.

論文

1. 姜弘，〈巴金給了我們什麼？〉，<http://www.aisixiang.com/data/20643.html> (2008/9/9)。
2. 胡德培，〈赤子真情——巴金及其《隨想錄》〉，《海燕》，期 1，2006 年 1 月，頁 24-27。

3. Bloom, Sandra L. "An Elephant in the Room: The Impact of Traumatic Stress on Individuals and Groups." In Golden, Kristen Brown and Bergo, Bettina G. eds., *The Trauma Controversy: Philosophic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s*.
4. Havel, Václav; trans. Kohák E. and Scruton, R. "Politics and Conscience." In Vladislav, Jan eds., *Living in Truth*.
5. Scott, Charles E. "Trauma's Presentation." In Golden, Kristen Brown and Bergo, Bettina G. eds., *The Trauma Controversy: Philosophical and Interdisciplinary Dialogues*.
6. Vorma, Helena; Naukkarinen, Hannu H.; Sarna, Seppo J. and Kuoppasalmi, Kimmo I. "Predictors of Benzodiazepine Discontinuation in Subjects Manifesting Complicated Dependence." *Substance Use & Misuse*, 40:4 (Jan, 2005), pp. 499-510.
7. Wegner, Daniel M.; Schneider, David J.; Carter, Samuel R. and White, Teri L. "Paradoxical Effects of Thought Suppression."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53:1 (July, 1987), pp. 5–13.

***Random Thoughts* and Ba Jin's Internal World**

Chris Y.H. Tsui

Abstract

Random Thoughts is a collection of essays, written by Ba Jin after the end of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The articles were post on *Ta Kung Pao* in Hong Kong from December 1978 to August 1986; and were grouped into five booklets, which were published by Joint Publishing in Hong Kong. There are different themes among the 150 essays, for example, criticizing traditional Chinese thinking, yearning for relatives and friends, and attacking undesirable social phenomena.

Ba Jin regained his independent thinking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hich makes *Random Thoughts* touch its every reader. From the text of *Random Thoughts*, this article uncovers Ba Jin's symptoms of post-traumatic stress disorder, such as flashbacks, nightmares and usage of hypnotics, which prove that Ba Jin has suffered from psychological trauma after the Cultural Revolution. With the aid of researches on psychotherapy, it is deduced that the composition of *Random Thoughts* strengthens Ba Jin's sense of security and independent thinking, widens his vision, as well as relieves his psychological trauma.

Keywords: Ba Jin, *Random Thoughts*, Cultural Revolution, independent thinking, psychological trauma